

对话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院长朱祖平：不能用管理代替监督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三年的延迟期,能够改变什么?这恐怕是当下摆在独立学院面前的一道难题。

教育部于2008年颁布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6号令),规定2013年3月31日为验收的截止日期。但期满之日,全国315所独立学院申请、通过验收的情况并不理想,仅占独立学院总数的10%。鉴于该情况,教育部决定把验收的最后期限延迟到2016年。

为什么独立学院的验收如此难以推进?独立学院要走向独立,真正缺少的是什么?该如何规划未来的路?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福州大学至诚学院院长朱祖平。

被难住的验收“大考”

《中国科学报》:2013年3月31日,仅有10%的独立学院申请验收。请问在独立学院“转正”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朱祖平:独立院校发展至今已经有10个年头,如今迎来了“转正”时机可谓好势头。但是人们也发现,教育部26号令虽然在法律上确定了独立学院的合法性,但在实际情况中,独立学院却存在着难以操作的困惑,如对出资人、操场、教室、人均图书资源、人均住宿面积等要求独立学院几乎难以实现。

以人均图书资源为例,文件要求每生拥有80-100册图书,每年每生还要加3册,且捐赠的图书、电子资源不算在内,对于一所万人院校而言,这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也不符合电子化的大趋势。

过高的门槛恐引发日后验收的公关行为——独立学院一方面向教育官员公关,一方面向专家组公关。因此,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做出更科学合理考虑,从而保证独立学院能够顺利“转正”。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验收独立学院,要重点考察什么?

朱祖平:独立学院的验收依靠的是教育专家,而不是普通人。教育专家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把握一所院校的资源条件、办学模式能否充分实现培养目标。在我看来,导致一所院校关门,不是它的办学条件不行,而是它的教学质量不行,生源没有了。而教学质量与教学资源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能够配置而不是是否拥有教学资源,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在开放性的背景下,可以更好、更灵活地整合外部资源,这已经是一种基本趋势。因此,教育专家应通过多种渠道,综合考察一所本科院校能否运作得下去,而非过度关注资源不够。



“独立学院走向独立是有出路的,必须给它们各显神通的机会,不能用管理代替监督。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采用什么方式来培养学生,应该放手让独立学院自己思考。这就像国家制定了产品的验收标准,而不去干涉怎样生产出来一样。教育部要求独立学院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两者更多地与企业结合。在学生培养上向市场方向引导,在资源配置上就不能往市场方向引导吗?我举个例子,解决实验室建设的问题可以把实验室、教师安置在企业里,这比自己建实验室让工程师进校待上三五年的效果更好。

在这类问题上,大学有更多的能动性,也希望主管部门相信群众,毕竟能够办大学教育的人,不管是学院管理层,还是出资的企业家,其出发点更多的不是为了获利。

独立要解决师资问题

《中国科学报》:独立学院真正走向独立,较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朱祖平:各个学校的情况有所不同。单就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而言,独立后留给至诚办学经费更多了,但同时跟母体脱离后品牌优势也相应削弱了,人才引进的难度也增加了。

以民办本科院校为例,引进人才的困难可

见一斑。一些民办本科院校与市政府达成协议,让教职人员进入事业编制,参照事业单位的待遇和管理,如此保证师资队伍不流失。这个诉求是基于知识分子进入大学任教更多是考虑工作稳定而设定的。独立学院想要独立,也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博士师资不足。实际上,高校最大的成本是师资,以人均年费用20万元计算,按照26号令规定的15:1的师生比,光师资成本一年就要开销上亿元,加上母体学校回报,想要引进更优秀的人才就无能为力了。

《中国科学报》:解决人才引进的问题,是否有其他变通的办法?

朱祖平:解决人才引进的经费问题,人们通常最先想到的是捐赠,但独立学院办学历史短、校友积累少,加之国家在税收上没有营造良好的捐赠氛围,这条路至少在近5-10年走不通。

当然,出路还是有。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当下,很多资源并非要自己占有。比如师资,通过计算,我们发现请外教教英语的费用比请国内教师教英语的费用要低,而且外教授课本身就能营造一种氛围。采取开放办学的理念,独立学院可以以一年一签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调配师资。

开展上述行为的前提是,主管部门要对独

立学院主体出资人予以信任,要让出资人(学院院长或企业代表人)参与讨论,要相信市场能够作出调节。

走差异化路线是“王道”

《中国科学报》:有人把独立学院的出生比作“怪胎诞生”,那么这个“怪胎”要走向正常,要注重改变什么?

朱祖平:很多独立学院自一出生起,就在专业、师资上依附母体,整体定位、特色、课程也跟母体无差别,天然难以产生特色。但是经过10年摸索,一些独立学院逐渐摸索出了自身的特色。

从知识到知识应用主要有三个阶段,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以至诚学院为例,学校的学生屡次在国际竞赛中胜出,得益于学校对应用研究的重视。至诚学院区别于本一办学,强调对知识应用的探索,在教学、实训基地、开放实验室等方面下了大力气;同时,在教师的激励机制上,可以以指导竞赛来冲抵理论教学,让整个培养模式和激励机制服务于应用化教学。

总之,独立学院走向独立是有出路的,必须给它们各显神通的机会,不能用管理代替监督。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有哪些独到的地方?

朱祖平: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的王后被送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她立即向刽子手道歉:“对不起!”实际上,当前社会最缺乏的不一定是知识深厚的人,而是有气质、有素养的人——他们有知识、有教养,给整个社会环境创造舒适感。

一些独立学院的生源本身就决定了它的特色。在一所企业家子女聚集的独立学院,他们想接班不单单靠的是专业知识,还有赖于他们的人文素养。这就要求独立学院在学生的行为规范、情操培养和增加见识上下更多功夫。

我们要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兼备的大学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培养当代绅士和淑女,其所指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特定人群,而是培养一种与人为善、吃苦耐劳的气质——真正的贵族需要吃苦,而非靠尊处优。事实上,福州大学至诚学院正是通过细致管理和引导来培养这样的人才,如乱扔垃圾随时有人跟在身后捡,校园主干道禁止机动车通行,思政课程改革融入多学科视野……文化行为的改变不会那么快见效,但是一旦人人养成,社会将变得更加美丽。

我国的高教转型应从长计议,慎重推进。这方面,我们有太多活生生的反面事例了。

本科院校职业教育转型应慎行

胡乐东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要推动一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时说:“先从现有的本科高校‘划’出一部分,推动它们更多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转型的学校可以是新建学校,也可以是办学历史悠久的学校;可以是学校里的绝大部分专业都转型,也可以是其中一部分专业转型。”

这意味着,不仅部分普通本科院校要向职业技术教育转型,一些重点高校也将面临整体或部分转型。如果按照几百所高校的数量计算,这毫无疑问将是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1999年大学扩招后的又一次重大高等教育改革。这对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显然是大有好处的。

不过,这种转型需要严格注意两大方面:一是不宜政府“一刀切”地强推,而应该用拨款引导和政策激励等办法;二是不宜迅速地大规模推进,而宜先小规模实验,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逐渐推广。换言之,对于前者,政府不应设置高校的数量、专业比例和时间表等硬性规定,而应该用软性的方式促进高校主动转型;对于后者,则要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原则。

葛道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已经有130余所高校提出了转型试点申请。那就应该先集中精力做好这些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转型工作,通过10年左右的时间,摸索、积累出宝贵的经验、做法。这么做,有助于避免很多仓促改革的问题。

进一步来说,从时间上看,“本科院校职业教育转型”这样重大的教育改革,本质上需要较长时间。何况像德国这样职业技术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不是一两天就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转型也应从长计议,慎重推进。这方面,我们有太多活生生的反面事例了。总之,重大的教育改革应该先有好的顶层设计,然后小规模实验,总结得失后,再进一步完善改革方案和举措,然后逐渐推广,及时发现问题的所在,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师)

域外传真

DIY实验室:研究者的另一选择

■安布尔·格里菲思

既充满官僚主义的僵硬制度,又束缚于旷日持久的基金和发表体系,大学研究的主宰正在缓慢改变。在一个全球都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大学真的是研究进展的最佳场所吗?

一场悄悄的变革正在发生。独立研究组织和DIY实验室在世界各处突然出现。与此同时,科学家对学术界的沮丧越来越多。因此,创业组织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独立研究组织通常针对某个特定问题而成立,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或者太空探索。DIY实验室的典型特点是建立在开放资源原则之上,并由此获得实验室设备与科学训练。这也为研究提供了另一选择模型,在大学学术团体的不满面前,这些研究应当引起关注。

尽管一些学者依然固执地认为大学是从事严肃研究的唯一场所,但航天工业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太空探索创业公司SpaceX建立在2002年,目的是绕过政府相关机构带来的官僚体制的延误。没有了大学执行委员会从上到下的管理,SpaceX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成为了首家完成发射和返回太空飞船的私人公司。

创业者和DIY者可以完成有质量的严肃研究,似乎证明了最好的以及最聪明的研究者往往并不在大学的象牙塔里,而一些公司显然

高教观点

去行政化从认识学术权力开始

■张婷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并要求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等。这就使得原本就已在高教领域广受关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更加凸显。因为无论是“克服行政化倾向”,还是教授治学,似乎都意味着行政权力应将原本不合理占据的学术权力归还给有资格行使学术权力的群体。然而,什么是学术权力?它与行政权力是对立的吗?在大学中有资格行使学术权力的主体应该是谁?是否能把学术权力简单地理解为学者权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如何平衡才能有利于大学的发展?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加以清楚地认识,大学去行政化的改革就可能失去正确的方向。

按目前学界的讨论,学术权力简单地说是

已经理解了这一事实。

DIY实验室和创业公司为驾驭有资质之人提供了机会,允许任何人投身科学,并且在不需要提供正式资质证明的情况下开展属于自己的研究。

建立一个独立实验室也变得日益简单。3D打印的魔力使得实验器材变得没那么昂贵,可以承担得起,不断发展的公众科学也会为DIY实验室的进展增加助力。低成本、非营利的开放出版模式正在兴起,这保证了研究得以被分享,进一步地减少了对大学研究模式的依赖。

获得传统的研究经费、资助基金对于新的组织和DIY者来说依然很困难,英国的研究委员会只向大型的、有资质的独立研究组织开放基金申请,准入门槛较高。然而,被迫从传统的研究基金模式中脱离,却的确能够带来极大的优势,包括更快地拿到基金,更自由地从事一些可能被研究委员的风险评估认为不值得资助的课题。

众筹研究的情况日益增多,也提供了一个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与研究委员会的公开咨询不同,众筹给了公众以自己的钱包投票的机会,这意味着真正使最多人受益的科学可能成为最容易和最快募集到资金的项目。这一模式

与大学里的科研相比,具有无与伦比的便捷性,快速、灵活、适应本地,解决方案驱动型的研究可以真正由公众推动,也用之于公众。

在社会与科学之间打造这样的直接联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尽管大学以及研究委员会已经多加尝试,希望改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但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的人仍然认为科学家是神秘莫测的,69%的受访者认为科学家应该更多地听取普通人的意见。基于社区的实验室则可能减少人们认知中,对科学的神秘主义倾向以及不信任。

这对于研究来说,是一段有趣且具有吸引力的时间。我们正处在一个学术生涯没有吸引力也没有安全感的时刻。与此同时,诸如众筹和公众科学的技术手段为有才华的先锋提供了真正的选择。

一些大家、名人陆续公开表示鼓励这种新型实验室的建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了解决方案驱动型创新实验室的模型,诸如纽约GenSpace之类的DIY社区实验室正在兴起。这一切,也许都表明我们即将迎来一场完美的风暴,它将系统地改变科研。

(作者系英国科学咨询工作者,本报记者韩瑾编译)

管理权的配合,因此它不应该是与行政权力完全对立的关系。

大学既然是学习、积累和创新高深知识的场所,说到底是个学术机构,开展和发展学术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大学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而学术权力正是因学术而产生,又为学术而存在的权力。因此,学术权力在大学的权力结构中理所应当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然而,大学却不是孤立的,与外界又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权力也难受到外力的影响。这种来自外部的力量如果有害于学术的发展,导致大学及大学中的学术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背离了根本目的,甚至异化到面目全非,就需要重新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大学中的行政权力作为学术权力的“外部力量”,要配合学术权力的运行,要为学术权力专注于学术的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

如果从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庆典上宣布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985”计划)算起,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国内顶尖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已奋斗了15年。这些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顶尖大学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回顾15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我们也曾有过几个阶段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研究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又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人们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特别是量化的标准更难以界定清楚。实际上,一所大学究竟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体现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心中的一个模糊性评价,尽管这种主观性评价是建立在一系列客观性事实基础上的。

既然标准难以界定,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先不纠缠标准问题,就按照目前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样子,从眼前的工作开始干起,边干边学。

首先,几乎所有人的一致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钱。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大学,每年的办学经费高达几十亿美元。相比之下,北大、清华每年从中央财政获得的拨款只有1亿多元人民币,维持运转尚显困难,遑论建设和发展了。幸运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期的飞速发展,办学经费是最早得到解决的问题。

但有了点钱后,大家发现,光有钱是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正如暴发户不等于贵族一样。中国大学如果想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手里必须要有一点“硬通货”,这些“硬通货”是什么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学科建设。起初,我们对学科建设的理解是狭隘的,认为学科建设等同于学术论文(尤其是国际期刊的论文)的发表数量。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几乎中国每一所大学都陷入了类似于“GDP崇拜”的“SCI崇拜”中。通过改变教师聘用、晋升和待遇标准等一系列措施,依靠高强度的“人海战术”,中国迅速成为学术论文发表的大国,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当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原本以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尊重。原来,对于学术成就的评价,不仅要看法文发表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质量,也就是论文的重要程度和引用频次。论文虽然发表了,但不能给同行以启发,别人当然不会引用,这绝非资源投入和行政命令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国内一些大学已经不再重视论文的发表数量,而是鼓励教授潜心研究更具影响力的重要问题。

与学科建设并行的是人才队伍建设,这是比较公认的另一抓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个办法是内部培养,但速度太慢,还容易导致近亲繁殖。因此,大学普遍采用第二个办法:外部引进。然而引进谈何容易。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竞争极为激烈,每所大学都在以各种优厚条件吸引最好的教授,吸引人才不仅仅要靠金钱的力量,还有环境和氛围等一系列因素。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人才被别人挖走。这是更加困难的挑战了。

近年来,在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中,我们发现,除了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外,他们普遍对本科人才培养极为重视。

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不少弯路。起初,大家被“研究型大学”吸引。的确,几乎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全是研究型大学,拥有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我们由此导出一个逻辑: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多于本科生数量。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近十年来,中国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呈几倍规模增长。然而,研究生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学术上的进步,反而因为资源紧张、空间有限而引发了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教授并没有足够精力指导如此规模的研究生,导致学生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准出现双重下降。

在第二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大学极其清晰的科研导向和研究生导向,导致大学的本科教育普遍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特别是本科生教学,呈现出下滑速度加快的趋势。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投入、发展方向、影响大学内部人的行动因素,全部集中到了那些可以为大学带来短期显著效益的项目上,而这些和本科生教学系统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一些大学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但总体来说,中国大学对本科生教学依然并不重视。这也许会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巨大损害。

重视本科生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文件上,必须有切切实实的投入。我认为,中国大学之所以不重视本科生教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本科生教学的投入没有立竿见影的显示度。在大学行政化倾向严重的中国,这一因素可能显得更加突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在本科生教学上还不太会投入。钱也许有,但不敢花,因为无法监控花钱之后的结果。除了不敢花之外,我们不太会花钱。科研经费可以用来购买设备(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区),但教学经费除了给教师发放讲课津贴,还能怎么花呢?按照现行资金管理体制的规定,可以用于劳务的人头费比例极低。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本科生教学投入量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走过了15年的道路,现在也许我们开始进入到第三阶段:回归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培养全球领袖人才。我们应当能够认识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上,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捷径可走,只能去做该做而且必须要做的事情。沿着这条路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埋头走下去,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已经忘记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当我们偶尔抬头擦擦汗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了。真希望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阶段

秦春华